

特約撰述

## 關於現代「大戰略」討論之辯證思考

Debates and Re-thinking for the Modern Grand Strategy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 壹、從戰略到大戰略

西方的「戰略」(strategy)一詞，從字源來看，其原意是「為將之道」(art of generalship)，亦即討論一個軍事領袖應如何正確地進行領導作戰的責任，正如 Antoine Henri Jomini 所言：「戰略是在戰場上巧妙指揮軍隊的藝術」<sup>1</sup>，據此，也讓關於戰略的討論焦點長期環繞在軍事範疇當中。但隨著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末爆發，並逐漸影響與重構了整個國際體系與國家間關係的內涵，從而迫使處於「政策工具」角色的戰略思維亦須隨之變化或更加細緻化。如同 Williamson Murray 指出的，「締造戰略是個既涉及內部政治影響與個人行為特質，又涉及外部事態與威脅壓力之複雜過程」<sup>2</sup>，正反映出所謂戰略思考之更全面基礎。

---

\* 本文部分原載〈關於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的辯證問題〉，《全球政治評論》，第 17 期（2007），頁 1-18，此處經過刪節與潤增。

<sup>1</sup> Antoine Henri de Jomini, *The Art of War* (El Paso: El Paso Notre Press, 2005), p.75.

<sup>2</sup> Williamson Murray and Mark Grimsley, "Introduction: On strategy," in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

進言之，如果要詳細說明近代戰略內涵變遷歷程的話，那麼就必須將轉捩點設定在中世紀末歐洲局勢的變化上。

正如 K.J. Holsti 所言：「曾發生在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並且在十五至十九世紀繼續被推廣而遍及整個歐洲大陸者，乃是有組織的政治權力與行政制度。……國家在十九世紀之前創造了民族，而在後來的兩個世紀中，則輪到民族主義抬頭，……並從而創造了國家。」<sup>3</sup>此處指出之歷史現實是，為擺脫中古時期（神聖羅馬）帝國與（羅馬天主教）教廷之控制，國家（state）這種新行為體首先重塑了歐洲國際體系內涵，同時連帶創造了主權（sovereignty）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兩個核心觀念；前者意指任何國家對內擁有制定政策與執行命令之完整與單一權力，對外則彼此互不干涉，至於追求主權之最高目標乃實現與捍衛所謂國家利益，為此，國家必須設法將其利益具體化並納入政策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新的歐洲國際體系強調主權平等，無論從傳統（層級性）或現實（國家能量不均）看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因此，利用各種手段爭取權力（power）乃「自然」成為各國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目標；更甚者，權力多寡不但關乎國家推動政策之支撐力，彼此權力對比亦將決定其彼此互動關係，一方面，維護對已有利的權力平衡狀態乃所有國家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則由此也建構了近代戰略觀念的基礎。

無論如何，正如前面提到的，十八世紀末爆發的工業革命不僅徹底地影響了歐洲戰略研究的內涵，同時讓更加複雜全面之所謂「大戰略」（grand strategy）逐漸形成一個新的討論範疇。基本說來，針

---

<sup>3</sup> See K.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4), Chapter 3.

對大戰略的討論應當涉及 3 個問題：(1) 什麼是大戰略？(2) 為什麼需要大戰略？(3) 思考大戰略時，應當注意之內涵重點為何？其中，第一個問題的目標在於確認「定義」，第二個問題牽涉到「目的性」之相關思考，至於最後一個問題，則是有關「方法論」部份的辯證。

## 貳、大戰略思維之內涵與時代意義

根據 John M. Collins 的看法，所謂的大戰略是指使用國家所有力量，透過威脅、武力、間接壓力、外交、顛覆及其他可以想像的手段以達到國家安全利益與目的的藝術與科學；他同時將此與傳統的軍事戰略 (military strategy) 做出意義區隔，後者是指憑藉武力來求取勝利的辦法，相對地則大戰略若能成功，應可不戰而屈人之兵。<sup>4</sup>可以這麼說，從「戰略」到「大戰略」的思維發展，不啻反映了工業革命掀起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後帶來的「無休止競爭」(permanent competition) 新狀態；此種環境一方面將國家間推向某種極端動態的互動關係當中，再加上前述主權與利益觀念的發展，最後驅使國家從最廣義面來解釋「生存」問題，亦即一方面「缺乏競爭力便無法生存」，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設法長期且持續地去組織並運用所有可資利用的資源，來維繫此種新定義下的生存挑戰，其結果便是 Erich Ludendorff 在 1935 年提出的「總體戰」(total war) 思維，他認為：「總體戰不單單是軍隊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參戰國每個人的生活與精神。」<sup>5</sup>從某種角度看起來，這或許是當前大戰略討論的第一個

---

<sup>4</sup> John M. Collins, *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 Chapter 2.

<sup>5</sup> Erich Ludendorff 著，戴耀先譯，《總體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頁 5。

踏腳石。

接著，在 Edward M. Earle 於 1943 年首先提出「大戰略」這個詞彙後，<sup>6</sup>英國戰略學家 Basil Liddell Hart 於 1954 年深入闡釋了相關理論，除將此種最高層次的戰略定義為用來「指導並調節一個國家所有軍事、經濟、政治、外交和精神資源，以達其基本政策所規範的政治目標」，<sup>7</sup>並指出「大戰略應估算與開發國家的經濟人力資源，以便維持作戰部隊，……作戰力量只是大戰略的一部分，它必須同時考慮並運用財政、外交、商業以及倫理壓力，以削弱對手意志，…在結合並調節使用各種工具之後，既顧及自身安全與繁榮，也避免損害未來的和平狀況」。<sup>8</sup>

必須一提的是，直到 1950-60 年代冷戰前半期為止，對於大戰略的思考固然更真切地反映出充滿競爭假定的新國際狀態，但是在操作上卻依舊相當傳統地將戰略必須處理的生存挑戰，設定為由於競爭所帶來的「戰爭危機」(war crisis) 上頭。相對地，在冷戰後半期出現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 概念則不啻反映出國際狀態的進一步變遷；<sup>9</sup>此種觀念的重點是，由於威脅具有多層次的性質，再加上全球化浪潮為國家間關係帶來更複雜難料的互動結構，因此所謂安全其實應同時考量軍事與非軍事層面（例如經濟安全或由此引伸出的能源安全等），<sup>10</sup>而且光靠軍力或軍事性思考是無

---

<sup>6</sup> See 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sup>7</sup> 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Plume Press, 1991), pp.334-335.

<sup>8</sup> 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p.322.

<sup>9</sup> Muthiah Alagappa 指出，這個名詞首先由 1970 年代末日本大平內閣提倡，其後則有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支持。Muthiah Alagapp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terpretations in ASEAN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and Policy Studies No.26,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up>10</sup> 參考：雷家驩主編，《國家經濟安全理論與方法》（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法解決此種新安全困境的。

總而言之，從傳統上長期面臨之有形挑戰（邊界戰爭），到必須為應付持續性無形挑戰（競爭）而進行資源的利用最大化，然後再隨著無形挑戰範疇因體系深化而不斷擴大（帶來綜合性安全甚至非傳統安全觀），所謂「戰略」既然作為捍衛國家存在的思維工具（亦即用來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的一套辦法），當然也必須與時俱進，這也是大戰略所以被稱為「大」的主要背景，至於其目標也從「追求作戰勝利」衍伸至「推動國家整體發展與競爭力」。

### 參、大戰略之操作實務

在此必須聲明，戰略內涵與層次之演進固然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必然反射，此種變遷影響的範圍也是無遠弗屆的。

首先，在此變遷與演進過程中，凸顯出來的不僅僅是安全來源的重新設定（從純軍事性到全面涵蓋發展要素），同時包括安全保障手段的重新思考（從強調競爭到也重視合作）；其次，正由於此種變遷涵蓋面之既深且廣，因此，理論上體系內「所有國家」都有必要根據自己的條件與需求，來設定為自己量身訂做的一套大戰略；最後，固然所有國家都有制定大戰略的必要性，如何「正確制定且成功執行」其大戰略設想，不僅涉及未來自身發展前景並影響國家擁有權力的表現，也將帶來某種「興衰」（*rise and fall*）的結果，<sup>11</sup>亦即體系「平衡」內涵的重新排列組合。

---

年)；陸忠偉主編，《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等，朱寧譯，《新安全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sup>11</sup>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表 1：大戰略思考之出發面基礎

主 觀 層 面	A. 國家發展歷程中的戰略思想脈絡 (1) 傳統世界觀的設定、轉型與發展 (2) 設定中長程宏觀戰略的政策習慣
	B. 政府效能問題 (1) 對建構大戰略的需求程度 (2) 將戰略研究轉換成政策評估的能力
	C. 國家發展現況 (1) 評估自身政經發展現狀之障礙性 (2) 民意支持度與輿論共識
客 觀 層 面	A. 國際權力分配現狀 (1) 權力計算問題 (2) 大國間戰略互動與假想敵設定
	B. 當前國際體系的行為規範與互動特徵 (1) 對於結構變遷的價值正當性評估 (2) 對於戰爭問題的價值設定
	C. 當前全球結構之變遷趨勢 (1) 全球化下國際經濟網絡發展及其政治反饋 (2) 網路世界與社會分化趨勢 (3) 多層次區域主義與國際建制對國際關係主體之影響

至於有關大戰略思考的應有內涵，可分成「出發面」（或可稱基礎面）與「運作面」（內涵設定與實際操作）兩個層面來探討（參考表 1 與表 2）。

首先在出發面基礎部份，大戰略思考必然與正確地反思（主觀層面）及觀察（客觀層面）有關，前者指的是國家捫心自問是否已具備建構大戰略框架的決策條件，包括創新性的政治文化傳統、充

滿活力與思考性的政府部門，以及能配合並支撐戰略政策的社會環境等；至於後者的重點則是再度強調，建構戰略的目標既在於處理國家於國際環境中的調適問題，那麼認清國際環境的內涵與變化性當然是前提要務，更何況從前述大戰略崛起的歷史背景介紹便可以發現，「不斷地進行質變」不但是工業革命以來世界體系最突出的特徵所在，捉住此種變化脈絡更是成功建構戰的第一步。

表 2：大戰略思考之運作面基礎

意識層面	A. 國際戰略思想的比較研究 (1) 總結霸權興衰史之經驗教訓 (2) 過去與現在大國戰略制定之比較分析
	B. 國際戰略環境的比較研究 (1) 國際體系之結構與內涵 (2) 陸權－海權－空權延遞的歷史意義 (3) 戰略思考的單一性與綜合性
	C. 制定戰略基礎的比較研究 (1) 政治體制與國家戰略 (2) 科技演進與霸權興衰
政策層面	A. 智性研究的基礎設定 (1) 提出研究計畫與建立研究機制 (2) 成果累積與政策建議
	B. 大戰略建議的提出 (1) 長期性計畫之思考與研擬 (2) 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
	C. 政策評估與回應反饋 (1) 設立高層常態性戰略討論機制 (2) 擴大對於相關新國際態勢內涵之研究與追蹤

如果能具備前述主觀與客觀思維，所謂大戰略才可能進入實際運作部份。在此，意識層面的工作主要是將前述對於國際環境的觀察，更具體化為思考國家因應對策的基礎，除做好「鑑往知來」的功夫外，也只有如此才能順利進入政策層面的討論，一方面設法提出具初步可行性的架構方案，然後則透過不斷地反饋與辯論以獲致最佳結果。

#### 肆、權力轉移下的大戰略

正如前述，由於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國際體系結構進行持續且快速變遷，作為維繫國家生存的思考性工具，「戰略」內涵自然也須與時俱進，結果使其逐漸超越傳統軍事狹義視野，進而帶來一套將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發展都概括進來的「大戰略」架構。

值得注意，首先，相較傳統戰略主要處理「現在式」問題（亦即國家當前面臨的內外現實挑戰），大戰略則更多思考「未來式」發展（包括國家對自我未來的預判或期許），例如伊藤憲一便認為「大戰略不外是國家的最高政治戰略，它決定著國家的百年大計」；<sup>12</sup>其次，隨著全球化浪潮對國家互動產生的拉近效應，為解決由此所衍生的一連串挑戰，相較於過去只有大國才必須去思考大戰略問題的傳統，今日則所有國家均不可避免地得將大戰略視為某種新的生活必需品；儘管其迫切性仍將因國家所擁有之權力大小不同而有所差異，亦即中等國家比小國更需要建構大戰略，而崛起中大國（例如中國）的急迫性當然也更高。

---

<sup>12</sup> 伊藤憲一，《國家與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9。

第三，如同 Paul Kennedy 所言：「在世界事務當中，領先國家之間的相對力量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主要原因是，不同社會間不同的發展速度以及技術與組織機構的突破，將為某些特定國家帶來更大好處的結果。」<sup>13</sup>例如，當前全球對所謂「中國崛起」的討論非但或許反映出若干國家間相對力量變遷的態勢，從所謂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角度看來，暗示權力重新分配之霸權更迭經常是國際衝突的結果，至於爆發衝突的原因，則不外乎是主要進行競爭之上層國家（major powers）間權力對比出現均衡（parity）甚或超越（overtaking）現象所致；<sup>14</sup>前者指後進者或潛在挑戰者由於成功推動「追趕」政策，以致權力逐漸拉近與領先者的距離，<sup>15</sup>而超越則指潛在挑戰者不僅有效拉近與霸權的權力差距，甚至透過某種躍進式發展導致其能力最終凌駕既存霸權之上。<sup>16</sup>總而言之，一旦發生權力轉移，不僅國際體系結構內涵將出現重大變化，由此帶來之重新分配既深深影響各國利益，此一歷史轉捩點亦往往是各種大戰略之考驗契機。

無論如何，目前相關討論所犯的最大問題是將「大戰略」與「國家戰略」（前者關注國家整體利益平衡與發展，後者則專注於解決國家層級地位問題）混淆在一起；除此之外，西方學界在建構大戰略

---

<sup>13</sup>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pp.xv-xvi.

<sup>14</sup> A.F.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Manus Midlarsky,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Jacek Kugler,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 2000).

<sup>15</sup> Moses Abramovitz, *Thinking about Grow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20-242.

<sup>16</sup> Elise S. Brezis, Paul R. Krugman, and Daniel Tsiddon,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1993), pp.1211-1219.

理論背後還有著一套對大國行為的既定看法，例如 Martin Wight 便曾經指出：「…大國進行擴張是種天性，…其力量經常透過文化、經濟和政治進行輻射，除非存在著巨大障礙，這些傾向都將導致領土擴張。」<sup>17</sup>正因如此，近期在看待「中國崛起」現象時伴隨著對「中國威脅」的憂慮不啻相當自然的結果。<sup>18</sup>

進言之，倘使體系中果真浮現某個新興大國，具既有優勢國家之應對選項大致有以下幾項：

- (1) 預防性戰爭 (preventive war / preemptive attack)；
- (2) 遏制 (containment)：建立戰略包圍網；
- (3) 約束 (constraint)：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施壓；
- (4) 接觸 (engagement)：設法加以吸納（例如和平演變）；
- (5) 追隨 (appeasement)：透過談判達成妥協以維持現狀
- (6) 迴避 (avoidance)：採取忽視（駝鳥）態度。

無論最終選項為何，它們都將成為國家制定「大戰略」時的思考與對策調適核心，也是研究者進行觀察時應著眼的重點所在；至於自 2018 年以來競爭愈發白熱化的美中互動，或將是最佳與最合時宜之分析對象。

---

<sup>17</sup> Martin Wright, eds. by 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 *Power Politics* (Leister: Lei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44.

<sup>18</sup> Randal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1-31；本書基本上建議美國應對中國崛起態勢選擇「接觸」政策。